

南湾子北遗址出土石雕人像发微

高云逸 安南

2016年发掘的赤峰市翁牛特旗南湾子北遗址F2内出土了两尊石雕人像(图一),这是继林西县白音长汗遗址之后第二次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兴隆洼文化晚期圆雕石人像,也是兴隆洼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的以组合形式存在的石人像。特别是其中一尊人像的嘴部和眼部还镶嵌蚌壳,以示口、目,可谓极为罕见。正因如此,二者的出土十分引人注目。最近发表的相关文章对这两尊珍贵的石人像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并提出二者可能是南湾子北遗址兴隆洼文化先民供奉的祖先形象,读来颇受启发。在此基础之上,笔者拟结合东北地区民族学材料对兴隆洼文化石雕人像的性质做进一步的对比分析,以期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线索。同时将这类造像置于跨区域的大的背景中进行观察,旨在揭示出其所蕴含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信息。

从石雕人像的性别特征来看,目、口嵌蚌者为女性,另一尊为男性。毋庸置疑,这种无实用功能的特殊雕像绝非普通生活用器,而是带有鲜明的仪式性及象征性色彩。必须要承认的,是精神与思想层面的问题并不是考古学擅长的研究领域。不过借助于“活的考古学材料”即民族学资料,我们还是能够获得破解这类石雕人像性质之谜的启示。众所周知,在考古学与民族学类比研究时,对比材料的选择是一个颇为关键的问题。就本文而言,我们将主要选取中国东北地区近现代的民族学材料,这是因为这两者比较对象处于大体相同的地理单元之内,创造它们的人群身处相似的自然环境之中,并经营着相近的业生模式,因而更加具有可比性和可信度。

凌纯声先生在其名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中对赫哲人的生活作了详细的记述。赫哲族信奉萨满教,而萨满的职责就是为人治病、驱灾、请神及求福等。“石头公公”和“石头婆婆”是赫哲族供奉的神物,两尊石像供奉在一个木制神庙内。当萨满看出病人身中邪魔时,乃求“石头公公”捕拿鬼怪。由此可见,这类两性石像在赫哲人那里实际上是一种庇护神。此外,民族工作者于1958年在黑龙江抚远县街津口村赫哲族调查时,村北山坡上还有一座小庙,里面供奉着男女石头神像,遗憾的是调查者对于神像的具体身份未做说明。由于上述两条文献记录的是同一个民族的信仰习俗,加之男女石质神像的组合形式也是相同的,推测二者的具体功用也可能是一致的。

需要说明的是,赫哲族的男女两性神像除石雕外还有木雕的,二者所扮演的角色也存在差异。例如佳木斯博物馆就收藏有一批赫哲族神像,其中的祖宗神有男女之分,头顶平者为男性祖先,头顶尖者为女性祖先,平时供在西炕墙的搁板上。可见,这种木雕男女神偶即是祖先的形象。耐人寻味的是,分布位置偏西的达斡尔族、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少见石质神像,但普遍供奉木雕神像,且所象征的多为男女两性祖先神。

达斡尔族信奉的神像极为丰富复杂,包括天神及祖先神等,以人为原型的木质神像既有仅表现头部的,也有表现人体全身的。据宋兆麟先生介绍,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鄂伦春人的木雕祖先神偶都是成双成对的,即男女神像。区别在于有无胡须,服饰上也存在一定差别。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奇乾乡鄂温克族所崇拜的诸多神灵中,主要的神是祖先神“舍卧刻”,系木雕人偶,一男一女。此类材料甚多,在此不再泛举。由以上所列材料来看,这些少数民族广泛盛行木雕男女神像所承载的祖先崇拜,表现出对于自身血脉渊源的强烈认同。

那么,南湾子北遗址出土的两尊石人像代表的究竟是哪一类神灵?是赫哲族的石雕人像一样作为庇护神,还是像上述民族中的木雕神像一样作为祖先神,抑或兼而有之。坦率地讲,尽管上文不厌其烦地罗列了多条民族学对比材料,但我们也不敢奢望在这样一篇短文中对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给出明确且肯



图一 南湾子北遗址出土石雕人像

定的结论,毕竟横亘在古今之间长达七千多年的巨大鸿沟使得这一问题的解决本身就是困难重重。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以上所做的分析能够为该问题的破解提供一些有益的、值得关注的线索,循此路径或许能够不断地朝着历史的真实走近,如此本文的写作目的也就基本达到了。

石雕人像的盛行是新石器时代的辽西文化区一个十分显著的文化特征,自兴隆洼文化至红山文化的两千余年呈连续发展之势,发现数量之多与延续时间之长放在全国范围来看也是十分罕见的。事实上,在相当于兴隆洼文化这一阶段,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地区也存在雕琢石质人像的文化传统。位于多瑙河畔的莱潘斯基维尔(Lepenski Vir)遗址因其极富特征的特殊雕像绝非普通生活用器,而是带有鲜明的仪式性及象征性色彩,还有一种是突出表现人的头部,一种是抽象的图案化形象,还有一种是象征性或半象征性的形象(图二)。

54号房址方形石板灶后面立置两尊石雕像(图二,1),一尊较为完整,属于上述的抽象图案化形象,另一尊则残缺严重,形象难辨。28号房址灶的后面有一个大的“石桌”,一侧有一尊石雕人像,另一侧有一尊形象不明的石雕(图二,4)。51号房址长方形石板灶的一角置一尊象征女性的石雕像(图二,2),44号房址发现仅表现头部和表现全身的人像并排立置的现象(图二,5)。该遗址出土石雕人像较为丰富,在此不再一一举例说明。行文至此我们不禁追问,其与兴隆洼文化是否存在联系呢?对此不妨做些比较分析。

第一,从造型特点来看,莱潘斯基维尔遗址出土石雕人像注重表现头部而疏于体现四肢,这一点与兴隆洼文化石雕人像相同。第二,从出土情景来看,无论是早年发掘的白音长汗遗址还是近年发掘的南湾子北遗址,石雕人像均位于方形石板灶的后方。令人震惊的是,莱潘斯基维尔遗址的石像竟也大都立于方形或长方形石板灶的一侧,既有单尊树立也有两两成对的情况。这或许暗示着灶旁是房屋内最为尊贵的位置,或者这些人像本身就以与火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第三,从绝对年代来看,莱潘斯基维尔遗址房址内采集十余例木炭标本的碳十四测量结果集中在距今7000年左右,与兴隆洼文化晚期年代重合。第四,从地理位置来看,上述遗址虽然空间距离遥远,但几乎处于相同的纬度带上,这也同样引人深思。总之,如此之多的共性特征显然不宜简单地解释为巧合,这些现象很可能说明早在距今7000年以前,两地之间已经建立起了远距离的文化联系。如果这种推测无误的话,那么这些线索的梳理对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当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苏秉琦先生很早就认识到,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出土红山文化彩陶罐上的菱形方格纹来自中亚大陆,他据此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意味着五六千年以前,这里是西亚和东亚文化的交汇地带和熔炉”。这种高屋建瓴的观点为从世界史的角度研究红山文化以及中国史前文化提供了指引,对此郭大顺先生曾做过十分精到的论述。基于以上对于石雕人像像的比较分析,我们倾向于认为,辽西地区与西方地区文化互动关系建立的时间不但可能在红山文化的基础上向前追溯,甚至在空间范围上也不局限在中亚,而是继续向西到达欧洲东部,如此便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于东西方之间文化往来历史的认识。正是因为两地间源远流长的文化联系,近年发掘的朝阳市半拉山红山文化墓地中出土的具有明显西方人种特征的石雕人像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也正是中华文明具有突出包容性的生动体现。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图二 莱潘斯基维尔遗址出土石雕像

西周王畿考古研究与阐释工作的重要价值

王一凡

西周考古与历史研究不同于夏商,夏商时期可供使用的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较为稀少,只凭借文献史学构建全面且宏观的社会历史面貌有一定难度。亦不同于秦汉及后世朝代,秦汉及以后的文献史料汗牛充栋,考古资料在研究古代社会时与文献史料已紧密结合。西周时期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介于其中,既可从文献史料中探索西周历史,但时常又面临“文献不足征”的情况。日益丰富的考古资料为系统全面研究西周考古与历史问题提供了大量基础材料。

当下,通常围绕封国考古新发现研究西周重大历史问题。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山西曲沃村一天马遗址和北赵晋侯墓地展开大规模考古发掘以来,诸如2004年发掘的山西绛县横水晋国墓地,2007年开始发掘的山西翼城大河口霸国遗址,2014年再次发掘的河南鹤壁辛村卫国遗址,2019年再次发掘的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遗址等西周封国遗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丰富的甲金文信息亦得以面世。利用各地西周封国考古新发现研究西周历史,已成为学术热点和重要增长点。涌现了一批有关政治制度、社会形态、礼仪器用

的研究论著,展示了一幅制礼作乐、封疆疆土、家国天下的历史场景,彰显了西周王朝大一统的政治地理格局。全国范围内西周考古新发现在成为西周历史研究新抓手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新问题。新问题的根源,大多直指西周王畿。西周王朝政治权力的发端,国家制度的根本,血缘宗法的源头,来自于西周王畿这一周王直轄统治区域,王畿内的聚落与人群构筑了西周王朝稳固的统治基础。西周王畿考古研究与阐释工作的重要价值凸显。西周王畿,一般来说是以三个都城:周原、丰镐、雒邑(在本文中用“雒邑”指周人在今天洛阳盆地营建的都城,与周原、丰镐出现在同一种语境下。因为周原、丰镐和雒邑是城址名称,三者是同类关系。在《逸周书》中与之相关的篇章也称“作雒”。而与“成周”同类关系的“周”和“宗周”,故周原、丰镐、雒邑并称,周、宗周、成周并称。)为核心,涵盖都城附近区域中的贵族采邑、土田,一般居民点等不同等级聚落的一片政治区域,是指周天子直轄的西周中期政治区域。西周王畿不等于西周都城,也不是三处都城的总称,而是今陕西中部关中盆地及其周边,河南省中西部洛阳盆地及其周边,这一聚落分布最密,社会复杂化程度最高,政治系统最完善的西周王朝最核心的统治区域。

诚然,研究西周考古与历史可从诸多方面入手,

江西汉代生活图景研究——建筑明器视角下的考古学观察

吴元

观察生活图景,建筑是很好的视角。它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体,技术取决于经济水平、匠人工艺和文化交流,艺术取决于生活层次等级。汉代江西建筑明器普遍流行,尤其以东汉时期生产生活类建筑明器最为显著,涉及仓储、卫生、禽畜饲养、炊事、居住等方面。本文试图通过对江西汉代“地下世界”中建筑明器的研究,揭开江西汉代生活图景的神秘面纱。

农业建筑明器

这里的农业建筑明器包括陶仓(囤)、农作物加工明器和水井。其中,陶仓(囤)明器出现的频率最高,平面形制有圆形和长方形,圆形粮储称囤,方形名仓,多为泥质灰陶和红陶,部分为釉陶器。另外,在收获农作物后,要经过去秕和脱壳等加工流程。在宜春地区出土了粮食加工类模型明器碓房或舂房,平面为长方形,内置有碓臼/承盘,外墙壁面饰以斜方格纹。此类装置与同时期的河南三门峡陕县刘家渠村北东汉墓出土的碓房模型相似。此外,陶水井模型也为数不少,时常伴随着吊桶成为组合器,有平折沿弧腹型、折肩型、直筒型、带井亭型等四种。

农业明器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究其原因,与人口的剧增有一定关联。人口增长对粮食的需求大增,到了东汉时期,豫章郡的粮食调运到东郡、南阳、庐江等地,侧面反映了豫章郡粮食富足盈余,储藏粮食也成为生活习俗的一部分。此外,两汉之交,北方动乱,大量北方人口为躲避战乱南迁。东汉初年南迁人口“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地广人稀的江西应在其列。豫章郡人口增量中应有大量北方移民,这些“北人”成为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同时带来了新的农业技术、理念、工具,粮食增产和多样水资源

厕所与动物饲养

厕所是家庭生活的重要设施,两汉时期厕所大多以溷厕形式出现,即厕所与猪圈相连。江西地区的厕所和猪圈各为独立形式存在。南昌东汉墓中,首次出现明器,为单体悬山顶两开间厕所,内部被墙体隔断,各间正面对开一门。圈养猪模型在东汉宜春地区曾有采集,该猪圈呈长方形,纵面一端设有进食口,通体饰方格纹。除此以外,九江、宜春、南昌出土过数具陶猪模型,质地有滑石猪和陶猪。除养猪以外,其他家禽家畜的养殖也较为普遍。南昌和九江地区都曾出土陶牛模型,萍乡地区出土汉牛车纹矩形墓砖。

但抓住“王畿”这一核心区域,目的是解决核心问题。王畿地区是西周王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这一地区的考古资料、金文材料、传世文献材料对于研究西周历史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正如《周礼·夏官·职方氏》云:“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用考古学方法考察西周“王畿之地”,首先可以观察西周王畿的地理区域,其次可以分析区域内的文化面貌,再次可以把握西周王朝的政治系统结构与权力传递方式,亦可展开探索西周历史的方方面面。

如今,王畿中都城的考古工作,在聚落考古理念的全面推广与深度实施中系统开展。丰镐地区考古工作自21世纪以来主要有:通过大规模系统调查和钻探,利用卫星照片、Arc-GIS等,初步建立了丰镐遗址考古地理信息系统,确定了丰镐遗址的四至和西周遗存的分布范围。对沔西曹寨古水池、曹寨南至大原村西人工古河道、大原村东古水池、沔东白家庄、普渡村、马营寨一带的壕沟等水系进行钻探与试掘,探索了水系与丰镐聚落布局、发展演变关系。围绕手工业考古开展了系列工作,2011、2013年发掘冯村北制骨作坊,2017年至2023年发掘大原村西南制陶遗址。对镐京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进行发掘,发现西周大型建筑基址、道路、陶排水管道、祭祀坑等重要遗迹。周原地区考古工作自21世纪以来主要有:2001年发掘了王家嘴、贺家地点,调查了周原遗址。2002年发掘了齐家村制作坊和礼村遗址。2003年发掘了庄辛铸铜遗址。2011年对周原地渠渠存进行了钻探和发掘。2012年发掘了周原遗址东部边缘的姚家和许家。2014年发掘了凤雏三号遗址。2016年至2017年发掘了凤雏六号至十号基址。2020年至2021年的发掘者提出发现了周原西周小城和大城,在王家嘴发现先周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认为西周小城面积约175万平方米,大城面积约520万平方米。

雒邑地区考古工作自21世纪以来主要有:2002年在唐城花园发掘一批西周墓。2003年在洛阳瀍河东岸中窑村发掘C3M575。2003年在洛阳东车站发掘3座西周墓。2004年在洛阳王城大道发掘西周墓1座。2007年在洛阳汉魏故城周闾门附近西周墓9座。2011年在洛阳铁道·龙锦嘉园发掘西周墓39座。2011年在洛阳东郊郭村发掘西周墓1座。

王畿中采邑的考古工作,在西周社会结构的考古学观察中持续发力。21世纪以来主要调查和发掘了岐山孔头沟、岐山周公庙、凤翔刘家庄、凤翔水沟、澄城刘家河、韩城梁带村、韩城陶渠遗址等大规模贵族采邑遗址。通过长期发掘与不懈探索,太公、周公、芮氏等采邑得以基本理清。在王畿西部的关中盆地,众多采邑总体上围绕核心都城—丰镐、周原分布,形成不规则的环带状,其间错落分布着普通村落性质的小型聚落。以采邑组成的聚落圈,对王畿内核丰镐——周原呈包围态势分布。

王畿中其他聚落的考古工作,在关中盆地和洛阳盆地地区聚落形态研究的探索中有序推进。在西部即今关中盆地主要有:1974年至1981年在宝鸡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发掘的与“骊”有关的遗存。1971和1991年在泾阳高家堡发掘的与“戈”有关的遗存,宝鸡戴家湾一带陆续出土的青铜器,以及2012年开始发掘的宝鸡石鼓山墓地。2018年开始发掘的旬邑西头遗址。在东部即今洛阳盆地主要有:1997年至2007年,开展的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调查,取得了丰

陶鸡、陶鸭、鱼纹砖模型都有大量出现,这些禽畜模型出现在墓葬里,一方面说明明器生前生活中曾饲养,另一方面说明这些禽畜已经融入百姓的饮食中。例如烧烤,江西出土的汉代方形十一排铁烤架体现古人制作熟食的工具有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此外,海昏侯遗址出土的青铜三足器,上端是一个肚大口小的容器,下端连接一个炭盘,之间并没有连通,和现代意义的“火锅”非常接近,上部是食物器皿部分、下部为一个炭火盘。发掘时,它已有被用过的痕迹,炭盘里有明显炭迹,锅内也有使用过的迹象,甚至还有板栗等残留物。通过有使用痕迹这点判断,它可能是墓主生前使用过的实用性物品,从侧面进一步印证了海昏侯生前吃“火锅”的饮食习惯。除青铜火锅之外,出土的还有一个火锅重要食具,发掘者认为是吃火锅时的专用蘸料器皿,具备加热保温功能,这已经与现代人吃“火锅”方式相似。

炊事之器

与饮食紧密联系的烹煮器具便是灶,自人类学会用火,灶即成为重要的生活设施。江西地区灶具随葬的首次发现在南昌永和家族墓M13,该灶为长方形,在其正面有四个灶门,灶面上四个火眼,配备有日常烹饪所需的釜、甑、盆、罐等,后缘和右侧有矮隔墙,分隔角落处有烟囪,丰富程度超乎想象,再现了汉人厨具的配置和组合情况。其后见于东汉时期,以船形灶为主,部分施釉,除了火眼上的差别,彼时形象变化不大。王充《论衡·讥日篇》言:“推生事死,推人事鬼。见生人有饮食,死为鬼当能复饮食,感物思亲,故祭祀也。”《汉书·五行志》云:“灶者,生养之本。”刘熙《释名·释宫室》对灶的解释为“灶,造也,创造食物也”。这些灶明器的随葬应是以生活中的灶台为原型,对现实生活的模拟和参照。

此外,部分东汉墓出土食案,有素陶案和釉陶案,皆长方形。

居住类建筑明器

居住类建筑明器与生活紧密联系,基本为生前居住样式的缩小化模拟。江西南昌永和村西汉中期墓M14随葬一件虎殿顶建筑明器,平面呈长方形,屋内设置齐全,分前后两部分,布局与秦汉时期居所“一堂二内”形式中的“日”字形格局相同。此外,该墓为双室土坑墓,墓室底部和四周堆积木炭,后室底部设有一条用筒瓦砌成的排水沟。可见该墓主在生前已掌握了建筑的防潮和排水技术,生前建筑可能已在居所内使用了筒瓦建筑材料。之后至东汉末期居住类建筑明器基本未见。

探讨建筑样式总体状况则需借鉴更多墓葬本体面貌。两汉时期江西墓葬形制以竖穴土坑墓和砖室墓为主,前者在东汉中期以前较为流行,土坑墓形制较为简单。砖室墓自东汉初期开始出现,至东汉末期都普遍使用,东汉中期以前的砖室墓与土坑墓形制接近。从东汉早期至东汉结束,江西葬制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赣州狮子岭墓葬长方形单室画像砖顶墓,

硕果成。此外还有济源柴庄,滎地鹿寺等太行山东南麓的重要遗址等。在丰镐和雒邑之间,即关中东部和洛阳盆地西部,西周时期处于王畿中何种位置亟待研究。这一区域的考古发现相对较少,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在关中东部,陆续发掘了耀州活龙村、长安少陵原、长安贾里村、华县东阳等重要遗址。在三门峡地区有“骊”和“焦”有关的遗存。

可见,现今西周王畿考古工作已初步揭示了从内核都城,到中层采邑,再到其他普通聚落的王畿聚落圈层结构,西周王畿考古研究与阐释工作正蓄势待发。从必要性上来说,在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愈加丰富的今天,有必要对西周王朝的核心统治区——由东部成周和西部宗周组成的王畿地区进行全面、宏观而系统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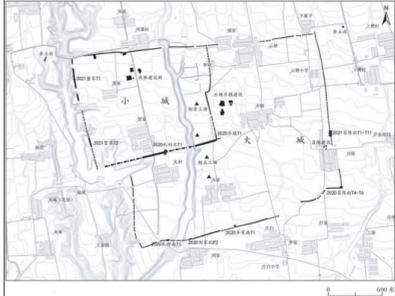
从可行性上来说,全面梳理西周王畿区域内的已有考古资料,围绕重点问题进一步对重点区域、重点遗址开展考古调查、发掘、研究与阐释,充分且合理地利用金文材料、传世文献史料,将构建更为全面、可信的历史叙述体系。

从价值意义上说,西周王畿是西周王朝的核心政治区域,是多元人群汇聚的地理单元,是先秦时期一些历史事件与变革发生的关键区域。西周王畿考古研究与阐释工作,将助力剖析西周王畿政治系统结构与权力传递方式,将呈现西周时期的人群、社会与国家形态,将对宏观研究先秦古史有重要价值意义。

不过,西周王畿考古的研究与阐释工作仍存在一些可以更加深入之处。首先,从整体视角发掘和研究西周王畿仍需强化。目前王畿范围内考古工作大多集中于都城与大型采邑,都城周边次级聚落是未来工作的一个方面,西周王朝都邑体系的研究有待开展。其次,对于西周王畿圈层结构的认识仍需明确。王畿内的都城、采邑目前已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但其他聚落的性质、关系、归属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索。最后,西周王陵是西周王畿考古必须回应的重大问题,围绕都城聚焦王陵开展区域调查与专项调查,亟待提上日程。

综上所述,在考古新发现与西周历史问题研究分进合击的大背景下,西周王畿考古研究与阐释工作期待着考古学界与历史学界同向发力、同心共答、同学共研。整合资源开展西周王畿考古,深化研究与阐释工作,具有重要价值和关键作用。由此,将回答夏商何以秦汉,中华何以乐土,多元何以一体等西周历史研究面临的重要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图三 周原西周城址(来源:周原考古队《2020—2021年周原遗址西周城址考古简报》)

上高西溪城头M1的十字状砖室墓,南昌青谱施家窑多室墓,这些葬制较前期复杂多样,个别拥有丰厚陪葬或较高身份地位的人在随葬物上丰厚,少数墓葬甚至表现“奢华”。南昌海昏侯墓及其内的礼制性建筑,平面分别呈方形、“凹”字形、长方形,祠堂和厢房为回廊形建筑。墓园围墙用夯土筑成,礼制性建筑平面形制“凹”字形,回廊形建筑格局。不过这是零星情况,大部分地区平民墓形制较为简单。

文化因素

考古资料表明,江西汉代建筑明器在西汉时期总的比重较小,到了东汉时期比重上升。在南昌和宜春地区分布多,在其他地区分布少。西汉早期宜春地区是仓储明器的发生区,西汉中后期大落,基本不见,东汉开始普遍流行。水井、家庭饲养、炊事及其他建筑模型与仓储明器情况基本一致。居住类建筑明器在西汉中期出现,之后不见。随葬建筑明器在各时代和各区域的比重差异反映了汉代江西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当然,这一问题不是孤立的,而与江西自身的经济结构和汉文化的传播进程密切相关。

俞伟超在《考古学中的汉文化问题》认为汉代模型明器的发达主要是由大土地所有制的经济面貌所决定的。江西土地分散,基本为自耕农经济,土地兼并状况不如北方,难以形成大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新的农业技术及调配劳动力在自耕农面前推广缓慢,经济发展水平相应减弱,以建筑明器为代表的葬俗也会种类有别,轻重不同。另外,建筑明器广泛分布于南昌和赣西地区,与江西汉墓的分布基本一致,都与当时的郡区中心历史背景有密切关系。南昌是豫章郡的郡治所在,赣西靠近长沙国,地理之便有利于文化之传播。不过整体来说,豫章郡远离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经济发展存在差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文化习俗在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之后展开恰如江西汉墓建筑明器反映的情况一样。文化传播也不是简单地继承或模仿,而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呼应。

虽然江西汉墓所传递出的信息大于文献记载,“豫章出黄金”的描述让我们对文献记载产生了质疑,海昏侯遗址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对西汉代社会的认识,琳琅满目的黄金、巧夺天工的器具、精雕细琢的配饰……让人不自觉地产生了汉代豫章郡“奢华”的认识。但寻常百姓家建筑明器时空分布的多寡映射出的经济状况在于西汉时期江西在缓慢发展,东汉时期的社会在蒸蒸日上;南昌和赣西地区发展较快,其他地区发展较慢;农业类建筑明器较多,非农业建筑明器较少。通过建筑明器可以直观地了解到汉文化的传播进程,以及背后所体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开发程度。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江西发展的基础,得天独厚的天然资源是发展优势,而东汉初年外来人口是开发的加速器,在此之上东汉时期的江西实现了温饱无恙和经济发展稳定向前。待到三国时期,东吴政治中心先后迁移至武昌再建业,南方崛起,江西地区得到了深度开发。

(作者单位: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